红军东征：揭开全国抗日救国之序幕

■薛闫兴 史绍华

东征战役，是红一方面军为实现中共中央“巩固扩大现有苏区”“打通抗日通道”战略意图，于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组织实施的东渡黄河、出师山西的运动战。此役唤醒华北乃至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揭开全国抗日救国之序幕。

主动出击，积极准备

1935年12月，针对阎锡山一系列“防共反共”部署，以及国民党军西北“剿总”阻止红军向西安或晋西发展的围困封锁态势，中央军委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决定主动出击，确立了“以主力东渡黄河，出师山西”为主体的东征战略。

为保障东征作战顺利推进，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于12月24日签发《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计划》。随后，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周恩来拟定了《第一步行动计划中的后方工作计划》。

此后，陕甘苏区迅速开启紧张、细致而全面的作战准备：通过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扩大充实了第1军团，组建了第28军、第29军等武装力量；以痛击进犯敌军、扫除民团据点、深入开展群众工作、拓展苏区范围、联合东北军推进抗日统一战线等举措，巩固了战役后方；通过抽调骨干力量、开展专项培训等方式组建地方工作队与游击大队；统筹收集物资、征调技术工人、赶制渡河器材，全速推进渡河人力、物力等筹备工作；通过分层开展政治动员、政策宣讲、组织强化、下发作战指示、组织誓师动员等方式强化组织领导，统一东征入晋思想；组织精干力量现地侦察、反复踏勘，最终确定渡河方式与具体点位。

至1936年2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经过近2个月艰苦准备，完成了思想统一、组织健全、领导强化、人才储备、临战训练、物资保障等各项准备工作，为夺取东征战役胜利奠定了基础。

强渡黄河，抗敌反击

1936年2月20日晚，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和第15军团兵分两路，隐蔽夜渡黄河。先头第2师第5团、第75师第223团在被守敌发现后，冒着枪林弹雨展开强渡，迅速突破敌军沿河防线，巩固扩大渡河场，掩护后续部队于23日全部渡过黄河，控制了辛关、老鸦关等渡口。

位于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的红军东征纪念馆。 资料照片

阎锡山急调4个旅会同第71师合力堵截红军北进，企图对已强渡黄河的红军实施反击作战。25日至27日，红1军团根据方面军“准备打援”训令，在吕梁山区中阳县关上村、郭家庄地域，采取包围监视占据要冲之敌、截断敌内外联系、南北夹击围歼、尾随追击狠打等战术手段，相继击溃敌晋绥军独2旅第4团、第3团大部。

东渡黄河不到10天时间，红军以伤亡300余人的代价，先后歼灭击溃敌5个团、俘敌1200人，夺占了石楼、孝义、中阳、隰县4县交界的枢纽地带。

3月4日至10日，不甘失败的晋绥军调集机动部队编组4个纵队，由北东南三面向红一方面军逼近。第1军团、第15军团集中兵力对兑九峪敌第2纵队形成合围态势，采取正面突破防御、强行穿插推进等战术手段，在取得重创敌2个团、迫敌2个纵队后撤的战果后，为避免陷入不利态势，遂以保持接触惑敌、主力逐次回撤等方式主动撤出战斗。

兵分三路，南下北上

3月上旬，蒋介石对红军东渡入晋行动深感不安，紧急抽调国民党中央军约10个师火速驰援山西。为打乱蒋、阎国民党军的进攻部署，红一方面军决定兵分左、中、右三路向汾河流域及同蒲铁路南段展开进击作战。

3月16日至17日，红一方面军主力以南北并进、钳制增援、佯攻惑敌等战术，向霍县南、北地区发起攻势，顺利突破敌军汾河堡垒线。为夺回被红军占领的沿河地区及渡口，阎锡山命其4个纵队向石楼方向展开全线进攻，直接造成晋南、晋西北及太原周边守备兵力被大幅削弱。红一方面军趁机采取中路军游击战牵制敌主力、左路军乘虚北上威逼太原、右路军迅速南下伺机夺控的部署，左路军东渡汾河袭击介休县城，继而北上袭击文水、交城，直接威逼太原；右路军主力先后占领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曲沃等县的广大村镇，切断了同蒲铁路交通；中路军通过广泛发动当地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组织群众武装、以游击战法迟滞消耗敌军等手段，既钳制了晋绥军主力纵队、有效控制了既占渡口，又为红军后续作战积累充足的人力与物资基础。

3月25日，红一方面军首长针对敌急于夺回被我占领的黄河渡口、将红军封闭在山西境内加以歼灭的企图，针对性地调整了三路大军作战任务。至29日，红一方面军三路大军采取阻击迟滞防敌南北夹击、机动袭击威逼太原等方式，坚决防范住国民党晋绥军、中央军的南北对进部署，有效遏制了敌军的合围企图。在兵分三路南下北上的作战进程中，红军通过打击地方反动势力、破坏敌交通铁路设施、广泛发动群众抗日、组建地方抗日武装、持续扩充红军主力等一系列有力举措，先后组建多支地方游击队、成立抗日独立团，累计破坏同蒲铁路线150余公里，扩充红军队伍3000余人，筹集抗日经费7万余元，得到了作战区域内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与广泛支持。

抗敌“进剿”，回师陕北

3月下旬，国民党将入晋的中央军与晋绥军合编为第1、第2路军，企图以全面的“进剿”作战各个击破入晋之红军，以实现将红军围歼于山西境内的图谋。

从4月4日起，针对晋绥军已重新占据全部黄河渡口、主力全线压进的战场态势，红一方面军逐步收拢兵力，以集中力量粉碎敌军“进剿”、恢复西渡交通线为核心策略，一边节节抗击敌军进攻，一边持续向晋西地区完成集结。面对敌军多路多方向的围追堵截，左路军以分路突围、遭遇歼敌的灵活战术冲破了敌军层层封锁；右路军则以部分兵力佯装向汾河以南推进，吸引敌军主力南下，主力则隐蔽转进，趁势快速北上攻克吉县，摧毁了敌军多处沿河据点。至21日，红一方面军左右两路军彻底摆脱“进剿”敌军的围追堵截，在晋西完成兵力集中。

5月2日，针对敌采取的堡垒主义推进战法和欲将红军压迫在黄河东岸狭小地区内予以消灭的作战企图，红一方面军根据“全军暂时撤出山西返回陕北”的决策指示，下达了西渡黄河的命令。随后，各部队利用夜暗条件，采取隐蔽掩护、分批渡河等方式，在“进剿”之敌星夜追击下，迅速跳出敌封锁圈，全部返回陕北苏区。

红一方面军历时75天的东征作战，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军事上，给晋绥军以沉重打击，歼敌7个团，俘敌4000余人；迫使“进剿”之敌撤回山西，恢复和巩固了陕北苏区；扩充兵员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壮大了红军力量，缓解了经费压力；部队积累了渡河作战宝贵经验，提高了战斗力。在政治上，红军以实际行动表明抗日救国主张，激发了广大群众抗日救国热情，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展，为红军后续出师华北抗日奠定了良好群众基础，并给予阎锡山的封建统治和反共媚日政策以沉重打击。

史说新语

寻人启事揭开尘封三十载的英雄事迹

■周 一

1984年的一天，四川省岳池县大佛乡村民柴兵荣偶然看到报架上的一份《四川日报》，上面刊登的一则寻人启事让他心头一颤。“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朴达峰阻击战中英勇杀敌”“因负重伤，回国住院”……启事里这些描述和父亲的经历高度吻合，唯独名字有一字之差——报纸上的英雄叫“柴云振”，而父亲更名前的名字是“柴云正”。

回家后，柴兵荣拿着报纸向父亲求证。起初，柴云振怕身份曝光后给国家添负担，不肯承认自己立过功。或许是感念老部队寻找的艰辛，或许是意识到身份难以隐瞒，他终于松了口，对着儿子讲起当年在朴达峰阵地上，和战友们浴血奋战的往事。在儿子的反复劝说下，他终于动了回老部队看看的念头。这一趟，证实了部队寻找的战斗英雄正是他。可老人一直用的名字是柴云政，怎么会是“柴云振”呢？这位“柴云振”究竟立下了怎样的战功，让部队时隔30余年仍继续寻找？

时间回到1951年5月底，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进入艰苦的转移阶段作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凭借机械化行军和空中优势，从志愿军一线3个兵团的接合部实施快速机动穿插，企图撕开志愿军防线。在中线区域，处于“铁三角”以南的芝浦里一带的局势最为危急。这里地势平缓、道路纵横交错，是敌军装甲部队展开作战的理想区域，而其北侧不远处便是志愿军总部所在地，同时也是东线各部队向后方转移的重要交通枢纽，战略位置至关重要。

危急关头，志愿军总部下令让正在附近执行撤退任务的第15军立即调整作战部署，在芝浦里紧急构筑防线，以掩护东线部队和志愿军指挥机关向后方安全转移。

第15军军长秦基伟随即指挥部队在角屹峰、朴达峰、广德山、大德山等地构筑多道防御阵地。其中，第45师134团作为最前沿的第一梯队，重点扼守朴达峰要点，承担阻击敌人的核心任务。

四川日报
SICHUAN RIBAO
寻战斗英雄柴云振
柴云振原系我部八连七班长，在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扑达峰阻击战中英勇杀敌，荣立特等功，并授予英雄称号，因负重伤，回国住院，与部队失掉联系。本人见此启事或知其下落者，请速与湖北省孝感市39155部队政治部联系。
当年《四川日报》刊登的寻人启事。 资料照片

5月29日，战斗正式打响。美军第25师先派出两个连，对第134团驻守的朴达峰阵地发起试探性进攻。次日，在飞机、大炮的密集火力掩护下，敌军如潮水般发起多轮猛攻，阵地上瞬间陷入一片火海。第134团官兵充分发挥自身战术优势，集中轻武器重点打击敌军坦克后方的伴随步兵，同时抽调侦察力量为后方炮兵提供目标引导，利用中远程炮火精准摧毁敌军坦克。由于弹药有限，在顽强阻击一段时间后，官兵们纷纷冲出战壕，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

6月3日，第134团已在朴达峰坚守阻击5天，虽成功阻敌前进，但自身伤亡也十分惨重。为充实一线战斗力量，师、团直属分队及后勤保障人员被紧急补充到各步兵连队，各营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调整编组，集中剩余兵力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敌军的新一轮进攻。

此时，柴云振从师警卫连补充到3营8连，并担任7班班长。为拓展防御纵深、清除3营前沿的敌军隐患，他奉命带领全班主动出击，对敌军刚夺占的部分山头实施奇袭。柴云振将全班分为两组，趁敌军立足未稳，从两翼迅猛扑击。刚爬上山头的敌人尚未完成防御部署，就被这突如其来的进攻打乱阵脚，仓皇撤退。柴云振带领战友乘胜追击，一举拿下第二个山头。

通过观察，柴云振发现对面不远处还有一座海拔较高的敌军山头，基本能通视我方阵地，威胁极大。为拔掉这个“钉子”，他不等增援部队赶到，便带着战友们迅速冲向第三个山头。由于动作迅猛果敢，柴云振等人很快突入敌军阵地内部。但敌军试图固守，不断向山头增派兵力。柴云振当即号召大家，要坚决打退敌人，与阵地共存亡，弹药打光了就上刺刀，刺刀拼弯了就用石头砸。

殊死搏斗中，柴云振的右手食指被敌人咬断，全身受伤20余处。尽管如此，他仍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直到体力不支昏死过去。随后，营里派出的增援部队及时赶到，一举全歼守敌，成功巩固了阵地。

这场战斗中，柴云振带领7班浴血奋战，歼灭200余名敌人，接连攻占3个山头，为稳固营、团防线发挥了关键作用。与此同时，第15军遵照志愿军总部的命令，在芝浦里一带阻击敌人10天，共计毙俘敌军5700余人，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

战后，柴云振被紧急送往后方医院治疗。他全身负伤20余处，一度徘徊在生死边缘。一年多后，柴云振伤愈出院，可右手食指严重受伤，再也无法开枪。为不给国家增添负担，与原部队失去联系的柴云振选择回到家乡务农。他不知道的是，组织从未放弃寻找这位战斗英雄。而寻找一直未果的原因，除当时他因负伤被紧急转回国内、本人并不知晓自己立下战功外，问题还出在登记的名字上。原来，柴云振原名“柴云正”，入伍后连队的文化教员为他改名为“柴云政”，鼓励他多学习政治理论，做听党指挥的好战士，所以复员后他一直使用“柴云政”这个名字。在朴达峰阻击战的白热化阶段，柴云政从第45师警卫连被补充到第134团8连时，由于口音差异加上战事紧张，文书登记名字时误将“柴云政”写成了“柴云振”。

1984年，柴云振所在部队在编修英烈传记时，因缺少他的相关信息导致工作受阻，于是再次开启寻找这位英雄的工作。根据战友回忆，柴云振是四川口音，部队便在《四川日报》上发布了这则寻人启事，所幸被柴云振的儿子看到，老英雄这才走入公众视角，30余年前的英雄事迹就此被揭开。联系上老部队后，他正式将名字更改为“柴云振”并沿用终生。

1985年，柴云振作为战斗英雄代表团成员，赴朝鲜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35周年纪念活动时，朝鲜方面为他颁授了一级自由独立勋章。这份荣誉虽迟到了30余年，却是对柴云振在战场上立下卓越功勋的认可。它不仅是对这位英雄个人英勇事迹的最高褒奖，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慷慨奉献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的生动见证。

链接历史

烽火中的红色报刊

《晋绥日报》——跟着中心走，贴着群众改

■杨润鑫 涂一可

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阎锡山部在山西发动晋西事变，蓄意制造反共摩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驻扎在晋西北的山西新军在八路军支援下奋起反击，击溃顽军进攻，彻底结束晋西北地区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根据斗争形势发展，1940年2月，遵照中共中央电示，中共晋西南区党委与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合并组建中共晋西区党委，统一领导晋西北、晋西南、大青山地区党的各项工作。

为巩固和发展晋绥抗日根据地，加强对敌斗争宣传，中共晋西区党委决定，停办原晋西南区党委主办的《五日时事》与原晋西北区党委主办的《新西北报》，创办一份覆盖全区的统一党报。1940年9月18日，《抗战日报》（《晋绥日报》前身）在山西兴县石楞子村正式创刊，报纸为4开4版铅印形制。

创刊之初，《抗战日报》便明确办报使命，在发刊词中郑重提出“抗战到底，团结到底，建设晋西北”三大任务。身负紧迫的历史使命，初创阶段的《抗战日报》在日军严密封锁、根据地物资短缺等条件下艰难运行，竭力承担起动员军民、宣传政策、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重任。

然而，这一时期的《抗战日报》也暴露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问题。早期采编队伍多为来自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普遍缺乏敌后农村办报经验与基层斗争历练，版面内容大量堆砌泛化的国内国际新闻，本地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的相关报道占比较低，整体内容和晋西北基层的实际需求存在明显脱节。

针对这一问题，《抗战日报》从1941年5月起首次进行版面调整：一版以刊登社论和要闻为主，二版登载国内国际相关动态，三版全部刊登地方新闻，四版用于刊载专题文章。此外，报社同步强化全社的调查研究工作，分批组织采编人员深入县区村镇与抗日前线驻点采访，陆续采写刊发《目前开展村政权的几个问题》《征收公粮实验团的经验》《晋西北教育概观》等一批涉及基层政权建设、公粮征收、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深度调查报道，正式将办报视角转向晋西北本地的斗争与建设实际。

1942年，党中央向全党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从当年元旦起，为更及时反映根据地实际工作、强化对敌斗争宣传、推动生产发展，《抗战日报》由3日刊改为间日刊，同时提出“地方化、通俗化、杂志化”3项要求，作为后续改进办报工作的核心目标。同年4月20日至22日，报社专门召开座谈会，对照全党整风要求全面检视此前的办报弊病，梳理出报纸工作中存在的“聋、盲、哑、软”4个突出问题，即听不见基层群众的真实呼声，看不见一线斗争与建设的鲜活实践，讲不透党的政策主张的内涵要义，宣传舆论对敌斗争的锋芒力度不足。

为此，《抗战日报》学习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经验，从5月19日起进行第二次改版，版面布局更贴合边区实际：一版为要闻版，以刊发地方重要新闻与社论为主；二版设为地方新闻专版，集中呈现基层一线动态；三版为国内国际时事混合版；四版刊载与地方工作相关的文章及反映根据地建设、对敌斗争的文艺作品。改版后，相对冗余泛化的国际新闻报道从版面撤下，贴近晋西北群众生产生活的本土新闻内容大幅增加，报纸在版面设置上进一步趋向地方化，更契合边区干部群众的阅读需求。

1944年9月18日，《抗战日报》创刊4周年之际由间日刊改为日刊，同步调整部分版面。为适配根据地工作发展需求，报社进一步强化报纸的地方性、群众性定位，提出“大家办，大家看”“做什么，写什么”的口号，明确“写事实、写过程、写典型、写经验”的采写要求，推动报纸地方化建设走向深入。

同年12月，毛泽东同志对改进《抗战日报》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多到三版”，对新华社稿件不能全文照登，需按需摘编，强调报纸“不是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点明敌后党报“为本地群众服务”的根本定位。遵照指示，报社重点推进两项工作：一是联合各级党委发展健全地方通讯组织，按不同地区情况分类推进建设、整顿工作，让通讯员队伍成为报社联系群众、收集群众诉求的纽带；二是优化内部编审流程，对新华社动态稿件按需摘编、综合整理，除全局性重大新闻外，其余报道均结合晋绥边区实际需求决定取舍。至此，《抗战日报》探索出一条适配敌后农村环境、紧密贴合根据地实际的办报路径，对全边区各项工作的指导作用持续凸显。

抗日战争胜利后，晋绥根据地的中心任务转向争取和平民主、推进土地改革与解放区全面建设。《抗战日报》的报名已无法适配新的历史阶段使命，遂于1946年7月1日正式更名为《晋绥日报》，并在当日社论中申明：“本报今后将一本初衷，无条件地为我晋绥人民服务，晋绥人民的利益就是本报的利益，晋绥人民的疾苦就是本报的疾苦，使之真正成为晋绥广大人民的喉舌。”伴随办报使命迭代，报纸内容重心同步调整，将推进土改运动、开展解放区生产建设、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宣传反内战争取和平、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独裁本质作为核心报道主线。

这一时期，《晋绥日报》发起了影响深远的反“客里空”运动，为解放区新闻界的自我革命树立了典范。针对当时宣传中部分报道浮夸失实、隐瞒缺点的突出问题，报纸率先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开展自我整改。1947年6月，报纸在四版专门开辟《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批评专栏，此后连续刊登过往失实报道并配发采编人员检讨，不回避问题、不遮掩责任。对于群众反映某篇报道失实的线索，报社第一时间派人深入村落，当面听取群众意见，核查清楚后就将批评内容全文刊发。短短两个多月，专栏累计刊发相关稿件27篇。这场自我整改经新华社向全解放区推广后形成示范效应，迅速在全国解放区新闻界掀起反“客里空”运动高潮，推动全行业共同坚守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与群众性原则。

1949年5月1日，伴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推进与晋绥解放区历史使命的完成，《晋绥日报》正式终刊。报社骨干分赴多地创办地方党报，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重要奠基力量，也将这份扎根群众、务实求真的办报传统延续到更广阔的新闻阵地。从《抗战日报》到《晋绥日报》，在9年办报历程中，报纸先后完成多次调整，每一次优化都是跟着中心走、贴着群众改。正是始终紧跟党的步伐的坚定立场、始终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深厚根基、始终对新闻事业矢志不渝的赤诚初心，让《晋绥日报》穿越烽火岁月，历久弥新。

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高家村的抗战日报社旧址。 资料照片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发行电话：（010）68525572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全年定价150元 零售每份0.57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地址同社址）